

日本中国語教育の道路

王 顺洪 名和 敏光

内容提要： 本论文试图对日本从古至今汉语教育的发展过程作一系统性描述。日本是一个与中国有着密切而悠久文化关系的民族，在汉语学习方面一直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。在古代，日本人接触的汉语几乎都是文言，学习方法主要是“训读”，不过，即使那期间也存在着“直读”汉文汉诗的主张和做法。到了江户时代，随着日中贸易和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，以学习、传授、使用口头汉语为目的的“唐话”教育开始流行。明治维新以后，以与中国签定“日中修好条约”，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契机，近代日本的汉语教育迅速发展起来，不过，后来很快步入了为对中国进行扩张侵略服务的轨道。战后，日本的汉语教育端正了方向，为日中友好播种、架桥梁，开始出现了崭新的气象。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，197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，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，日本国民学习汉语的热情空前高涨，日本的汉语教育实现了真正的繁荣，进入了“全盛时期”。

（一）古代日本对汉语的学习与吸纳

一、关于“汉语学习”“汉语教育”范围的界定。

日本与中国有着密切而悠久的历史关系，在汉语学习方面一直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。然而，叙述古代日本汉语教育的历史，却是个非常大的难题。这是因为，该方面的研究至今还是一片空白。即使是著名的日本汉语教育史专家六角恒广先生（1919-2003），其研究范围也仅限于明治维新以后，最早追溯到江户时期。出现该种状况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：一是资料缺乏，有关古代日本人学习汉字、汉文、汉诗的资料与研究成果虽然不少，但有关他们是怎样学习汉语发音和会话的，却没有涉及；二是概念不清，古代日本盛行学习汉文汉诗，但学习的方法有两三种，哪种学习才属于“汉语学习”？只学其形、义不学其音算不算“汉语学习”？

六角恒广的近代日本汉语教育研究，“汉语”主要是指“白话”——现代汉语，包括南京话、北京话、上海话等，“汉语教育”是指听说读写（尤其是会话）能力的教学。六角恒广之所以将“汉语”范围限定在现代汉语，是因为他认为日本近代的汉语教育主要是现代汉语。古代汉语即“汉文”教学虽然存在，但所占比重很小，而且，日本自古以来流行的是“训读”汉文，与中国的古文阅读不是一回事，已脱离汉语学

习的性质。

六角恒广先生的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，贡献无疑是首屈一指、无与伦比的。可是，如果研究和叙述古代日本的汉语教育，仅局限于“白话”——现代汉语的话，那就真是资料难寻，路途狭窄了。实际上，“汉语”的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：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。

“汉语学习”、“汉语教育”可以有狭义的理解——现代汉语的传习，还应有广义的解释——不管是白话还是文言，只要是按照汉语的形、音、义来传习，都应称之为“汉语学习”、“汉语教育”。古代日本人所学的“汉语”基本都是文言，只有从广义理解“汉语学习”、“汉语教育”，才能打开古代日本汉语教育研究的天地。当然，不能笼统地将古代日本人所有的汉文汉诗传习都视为“汉语学习”、“汉语教育”，像“汉文”训读，虽学习的对象是汉文，但语法和发音已被日语化了，已不属于“汉语学习”、“汉语教育”的范畴。

二、汉字传入日本及在日本文字形成中的作用。

中国是汉字的故乡，从甲骨文算起已有四千多年历史，其间经历了大篆、小篆、隶书、楷书、草书、行书等字体的演变。秦朝统一中国，以隶书实现了中国文字的统一和定型化，标志着汉字脱离古文字阶段进入成熟时期。

汉字成熟不久便东传到了日本。据中国史籍《后

山梨県立大学 国際政策学部 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

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s, Faculty of Global Policy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s, Yamanashi Prefectural University

汉书·东夷传》记载：“建武中元二年，倭奴国奉贡朝贺，使人自称大夫，倭国之极南界也，光武赐以印绶。”1784年，日本福冈县志贺岛海边出土了一块金印，上边写着“汉委奴国王”几个字。有人推测，那就是当年中国汉光武帝赐给倭国王的金印，“建武中元二年”即公元57年。1962年，奈良县的一座古坟内出土了一把环形大刀，刀上刻着“中平口年五月丙年，造作文刃，百练清刚，上应星宿，不辟不口”二十四个汉字。据考证，该刀是中国东汉灵帝时代，即日本中平元年到七年间（公元184年—190年）铸造的。1951年，大阪府和泉市的一座古坟内出土了一面神兽镜，上边的铭文也是用汉字刻写的：“景初三年，陈是作铭，铭之，保子宜孙”，“景初三年”即公元239年。中国的《三国志·魏书·东夷传》记载：“景初二年六月。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。诣郡求诣天子朝献。太守刘夏。遣吏将送。诣京都。”倭女王特使回日本时，魏明帝曾回赠金印、铜镜百枚、五尺刀二口以及锦绢、珍珠等。有人认为，大阪和泉市出土的刻着“景初三年”的神兽镜，就是魏明帝回赠倭女王的。除了诸如此类的出土文物外，还有一些文字记录。据日本最早的历史文献《古事记》、《日本书纪》记载：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，即公元285年，天皇曾招朝鲜半岛百济国王仁到日本，教皇太子菟道稚郎子学习汉文，王仁把《论语》《千字文》带到了日本。据考察，那是较早输入日本的汉籍，标志着汉字大量传入日本。

考古文物与文献记载虽须进一步考证，但中国汉字至少于公元3世纪以前就传到了日本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公元七世纪之前，日本尚处于未开化的史前时期，虽然有本民族语言却没有文字。那时候，中国先秦时代的典籍《论语》《易经》《孝经》《山海经》等，通过朝鲜半岛陆续传入日本，日本人虽然不能读解其内容，但以天皇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深知其价值，对学习汉字汉籍抱有极大热情。公元285年应神天皇邀朝鲜百济国王仁赴日本，教皇太子菟道稚郎子学习《论语》《千字文》，可以说是日本中国语言文化教育的开端。十二年后，朝鲜高丽国派使节到日本，在递交的国书中有“高丽王教日本国”的语句，皇子菟道稚郎子读后大怒，将国书撕毁。天皇对免受高丽之辱很高兴，更钟爱皇子，重视文教。这件事说明皇子不仅能直读汉文，而且能发现其行文的不敬，水平已很不错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王仁那时是怎样教菟道稚郎子

学习汉文的，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。汉籍传入日本之初依据什么读法，一直是个疑问。一般有三种说法：一是直读，也称“素读”，即跟着老师鹦鹉学舌地念汉语音，完全不译，但光读不译不可能理解意思；二是训读，即不管发音只理解意思，可当时日本还没有发明汉文训读法；三是先按汉语音直读，然后译成日语理解意思，这是学习外文的通行方法。人们推论，汉籍进入日本的初期，从皇太子菟道稚郎子开始，学习汉文很可能采用的是第三种方法。也就是说，在汉文训读法和日本文字产生之前，日本人学习汉文具有外语学习的特点。那时候，日本因为没有本民族文字，只好借用外来文字，宫廷文书均用汉文书写。例如，在中国的《宋书·列传·夷蛮》中，有一份“末顺帝升明二年”（公元473年）倭国使臣向中国南北朝时宋朝递交的国书，与中国古文几乎没有区别。公元604年日本圣德太子亲自制定的治国纲领《十七条宪法》，竟全部是标准的汉文。

然而，对于日本民族来说，汉字汉文毕竟是外国语，代为本国文字工具并非长久之计。尤其是，汉语是孤立语，日语是粘着语，二者语系不同，汉文很难得体地表达日语的意思，所以，使用汉文只不过是暂时过渡现象。后来，日本人一边学习、使用汉文，一边探索适合于表现本民族语言的文字。到了公元八世纪末九世纪初，终于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本民族文字。日本文字的形成，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：完全使用汉字汉文。以公元604年圣德太子颁布的《十七条宪法》为代表，是标准的中国古文。到了公元712年问世的《古事记》，开始发生变化，虽还都使用汉字，但不少句子已具有日语特点，而且出现了借汉字时而表音，时而表意，混杂使用的情况。

第二阶段：用汉字标记日语发音。以八世纪末问世的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《万叶集》为标志，汉字几乎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含义，变成了单纯的日语标音符号，即所谓的“万叶假名”。而且，语言结构、表达方式完全脱离了中国古文，是纯粹的日语文体。

第三阶段：汉字与假名混合使用。公元八世纪末九世纪初，日本人日益感到汉字笔画太繁，用来标音很不方便，于是，由在中国留过学的吉备真备和名僧空海，在“万叶假名”的基础上，分别取汉字楷书、草书笔画创造了片假名、平假名，完全取代了用汉字

标音。不过，日本并没有完全抛弃汉字，而是词干用汉字表意，词尾和助词用假名表音，从而形成了汉字与假名、表意与表音混合的新文字，标志着日本终于有了成熟的本民族文字。

日本文字的产生过程表明，中国汉字是日本文字的母体，日本人起初学习汉文很有可能是形音义一起学。日本人在学习、接受汉字汉文，创造本民族文字的过程中，将大量汉字和汉语词汇吸纳到日语中，对他们后来的中国语言文化学习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三、公元七至九世纪奈良、平安时代“汉音”学习的推广。

汉字与假名、表意与表音混合使用的日本文字诞生之后，汉文代为日本文字工具的时期结束，但是，汉文学习并没有在日本消逝。公元七至九世纪的奈良、平安时代，正值中国封建社会鼎盛的隋唐时期，日本为了效法中国走强国之路，竭力汲取中国的先进制度与文化。该期间，日本通过遣隋使遣唐使等，从中国输入了大量汉籍，在皇室、贵族社会及佛学界，掀起了崇尚和学习汉诗文的高潮。

公元646年（孝德天皇大化2年）“大化革新”后，日本朝廷为了培养国家官僚，依据《养老令·学令》设立了专门的高等教育机构“大学寮”。大学寮设有“明经道”和“纪传道”等科目，以实施儒学教育的“明经道”为主体，教学内容以汉籍为基础，如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毛诗》《诗经》《周易》《史记》《文选》等。

日本朝廷在推崇和吸收“唐风文化”的过程中，十分重视“汉音”教育。所谓“汉音”，是指从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小野妹子使隋，打开与中国直接交流的通道到平安朝初期，迅速传入日本的以长安、洛阳为中心的北方汉语发音。当时，日本将这种新传入的汉语音称为“汉音”和“正音”，将以前传入的江浙音等统称为“吴音”和“和音”。日本史书《续日本纪》中天平2年（公元730年）太政官奏文有如下记述：“又诸蕃异域、风俗不同、若无译语难以通事。仍仰粟田朝臣马养、播磨直乙安、阳胡史真身、秦忌寸朝元、文元贞等五人、各取弟子二人令习汉语者。”（沼本克明著《日本汉字音历史》106页，东京堂昭和61年出版）其中所指的“译语”“汉语”即“汉音”。“学令”明文规定，“汉音”课是大学寮的基础课程，“学生先读经文，通熟后听讲授。”学生在上其它课程

之前，必须先用“汉音”读“五经”（《易经》《书经》《诗经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）。为了教习“汉音”，大学寮设“音博士”2人，从中国聘请。《日本书纪》691年（持统五年）9月项记载：“赐音博士大唐续守言、萨弘恪，书博士百济末士善信银各二十两。”《续日本纪》宝龟九年（公元778年）12月项记载：“玄藩头从五位上，袁晋卿赐姓清村宿弥，晋卿唐人也，天平七年随我朝使归朝，时年十八九，学得文选尔雅音，为大修额音博士，后历大学头安房守。天平7年（公元755年），唐朝音博士袁晋卿来日……。”公元792年（延历11年），朝廷颁发了鼓励学习“汉音”的敕令：“敕明经之徒，不可习吴音。发声诵读既致讹谬，宜习熟汉音。”（《日本书纪》266页）。

大学寮从设立到关闭存在了四百年，培养的学生具有深厚的汉学修养和较好的“汉音”基础。在遣唐使中，吉备真备（公元695—775）、菅原清公（公元770—842）、朝野鹿取（公元774—834）、藤原常嗣（公元796—840）等，均为大学寮学生出身，吉备真备还在大学寮任过教。这些优秀的汉学者，既能阅读和做汉诗汉文，也能用汉语音朗诵。他们有的多年在中国留过学，在汉学修养和汉语听说读写译能力方面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

公元793年（延历12年），日本朝廷为了在佛教界推广汉音，在学僧资格年度考试中，也要求用汉语音读佛经。“自今以后、年分度者、宜择年三十五已上操履已定、智行可崇、兼习正音、勘为僧者、为之。”（《类聚国史》，延历十七年四月敕）“自今以后、年分度者、非习汉音、勿令得度。”（《类聚国史·佛道部》，延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）后来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佛教界的“汉音”风没有儒学界那么持久，但“汉音”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传播。

自九世纪末以后，日本人用“汉音”直读汉诗文的风气开始减弱。其原因：一是随着中国唐朝的灭亡，崇尚“唐风文化”的高潮已经过去，学习汉诗文的热情趋于淡薄；二是公元894年（宽平元年）遣唐使中止，直接到中国接触和吸收中国文化的机会减少，从中国聘请音博士亦不可能；三是平安朝初期以日语文字的成熟和汉学的昌盛为背景，出现了经过训点整理的汉籍“加点本”，发明了汉文训读法并提高了精确度，汉文阅读被日语化衍变成了日本的第二国语，截断了与汉语语音语法的直接关系。因此，尽管汉学界仍有

一部分人坚持传统的学风，用汉语音直读汉诗文，并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以后，其间出现了荻生徂徕（1666—1728）、太宰春台（1680年—1748年）、雨森芳洲（1668—1755）、冈岛冠山（1675—1728）重野安绎（1827—1910）、青木正儿（1887—1964）等坚持用汉语音“直读”汉诗文的汉学家。但大部分汉学者和汉诗文学习者，则图省时省力，采用了“训点法”，将汉诗文按日语语顺用日语音诵读。还有的采取“目读法”，利用汉字的表意特点，只看意思不管发音。就这样，使汉诗文学学习脱离了汉语学习的性质与轨道，被纳入了日本国语教育的范围，而且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，严重影响到来后来日本人的汉语学习。

总之，日本人在江户时代以前，所接触的汉语主要是文言典籍。那时候虽然有些汉学者、儒学家，特别是在中国学习过的学问僧、留学生，不仅汉学修养深厚，能诗擅文，而且会汉语口语，加上定居到日本的“汉归化人”，他们在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中发挥了桥梁作用。但是，那时多数的汉学者和汉诗文学习者，读解汉诗文采用的是“训读法”“目读法”，缺乏汉语听说能力。“大学寮”重视用“汉音”直读中国儒学经典，但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语言，而是为了理解思想内容，欣赏艺术形式。该种教育虽广义上应属于汉语教育的范畴，但与以掌握语言知识、提高语言能力、进行交际为宗旨的汉语教育相距较远。那么，日本在江户时代以前，有没有专门对交际汉语的教习呢？目前还没发现有资料记载，即使有恐怕也不多，那时因受交通条件等限制，日本人与中国人接触的机会极少，对交际汉语的要求尚不迫切。

四、公元十七、十八世纪江户时期“唐话”学习的流行。

日本人学习汉诗文历史悠久，但作为专门的语言学习——以用汉语进行直接交流为目的，形成潮流，到了公元17世纪中期才开始。当时是德川幕府时代，中国是清代，随着日中贸易、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，白话汉语开始在日本迅速传播，当时被称为“唐话”。“唐话”的传播主要有两条渠道，一是长崎的唐通事，二是黄檗宗的禅僧。日中贸易往来，八、九世纪就已开始，到了十四、五世纪已比较频繁。十六世纪，葡萄牙、荷兰人敲开了日本的贸易大门。1639年，德川幕府为了抵制天主教，宣布“锁国”，长崎被指定为唯

一的只与荷兰、中国、朝鲜进行贸易的港口。随着日中贸易的频繁，象过去那样临时找翻译接洽中国商船，已满足不了需要。当时长崎汉归化人比较多，为了顺利地与中国进行贸易，长崎奉行从汉归化人中选拔日语好的，任命为“唐通事”，专门负责接洽中国商船的翻译工作及其它业务，第一个唐通事的名字叫冯六。

唐通事的职务是世袭的，唐通事为了使他们的子弟能够接班，对子弟的汉语传授从幼小时就开始了。唐通事传授汉语采取的是家教形式，主要是训练会话，发音材料用的是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诗经》等。日常用语和专业词汇，用的是自编的《二字话》《三字话》《长短话》《译家必备》《两国译通》等。孩子们学到一定程度后，接着读《今古奇观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厢记》等白话文学著作。为了督促检查子弟们的学习，唐通事们常常举办“唐韵劝学会”、“唐话会”，完全用汉语问答。经过天长日久的训练，子弟们到了十五、六岁，便可被任命为“见习通事”，跟着父兄接待入港的中国商船了。

那时，日本的中国贸易伙伴，大都来自江苏、浙江、福建一带。福建漳州当时是中国与日本进行贸易的最大港口。而且，日本的汉归化人“唐通事”，大都是从中国南方去的，他们说的是南方话，主要是南京话、福州话、漳州话。唐通事们的汉语教学，形式、内容、目的有很大局限性，学习者仅限于他们的子弟，汉语传播的范围不广。不过，其意义却非同小可，被后人称之为“崎阳之学”，它打破了日本历来的“训读”、“目读”汉文的传统，把白话汉语和培养口头交际能力纳入了汉语教习的轨道，开辟了日本汉语教育的新纪元。

唐话传播的另一条渠道是黄檗宗禅僧。公元1654年（承应3年，清朝顺治11年）7月，应长崎唐人寺庙主持的邀请，中国福建黄檗宗禅僧隐元隆琦（1592—1673）率弟子数十人抵日本，在德川幕府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大力支持下，在京都宇治建造了万福寺。随后，黄檗宗很快在日本流传开来，道场遍及关东、中部、山阴、九州地区。到日本的中国禅僧日益增多，不但带去了散发着浓厚中国文化气息的文物，而且用汉语讲经。有的书籍描写当时的形势是“唐音所闻，几遍于全国”。通过黄檗宗禅僧，一向崇拜中国文化的日本儒学者和武士们，亲自接触了唐人，看到了唐物，听到了唐音，深深为其所吸引。在黄檗宗禅

僧们的影响下，日本出现了一股新的文化潮流，被称为“黄檗文化”。

伴随着黄檗文化在日本的创立和传播，中国的白话语——唐话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，影响迅速扩大。例如，在当时幕府的都会江户，著名儒臣柳泽吉宝，20岁时就皈依了黄檗禅宗，晚年从师于中国杭州高僧悦峰道章，师父和弟子间问答，均用唐话。柳泽吉宝常把悦峰道章请到自己的别墅六义园进行笔谈，幕府将军德川纲吉曾亲自去六义园听过悦峰道章的讲书会。当时，在柳泽吉宝的门下，聚集了获生徂徕、冈岛冠山、鞍冈元昌等一批唐话学者，被称为“唐话师匠”、“濠园学派”，其中，冈岛冠山是师从长崎唐通事学的唐话。1711年，濠园唐话师匠们设立“译社”，举办唐话讲习会，在江户形成了学习唐话的中心。京都、大阪也有类似的情况。译社使用的教材——冈岛冠山编的《唐话纂要》（共五册，1716年秋由江户须原屋久右门出版），是当时最好的汉语教科书。

唐通事是为了与中国进行贸易而传授唐话，黄檗宗僧侣是为了宣传中国禅宗文化而传播唐话，两种渠道，目的不同，都使白话汉语在日本生了根开了花，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单纯学习汉经典诗文的传统，开辟了日本白话汉语教育的先河，此后，白话汉语传习日益成了日本汉语教育的主流。

然而，由长崎“唐通事”和黄檗宗开辟的汉语教育传统并没有很好地延续下来。在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制约下，中国到达日本的商船每年仅限于几十只，到日本的中国僧侣为数也不很多，唐话的传播影响虽然很大，但毕竟有限。后来，日本的汉语教育非但没有更大的发展，反而还有停滞、衰退的趋势。

（二）近代日本汉语学习潮流的兴起和发展

明治维新是日本的巨大历史转折，一个封建落后、闭关自守的岛国，一下子敞开了大门，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迅跑，根本改变了日本的旧貌。随着国力的增强，日本向外扩张的野心日益增长，于1894年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，通过“马关条约”在中国获得了许多特权和利益，1931年出兵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，1937年全面侵略中国，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。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近代日本的汉语教育，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。该时期日本汉语教

育的兴衰，与日本对中国扩张侵略的强弱明显成正比，其中的汉语学校有官办和民办之分，但在办学宗旨、方向和发展过程中，均未摆脱这一影响。近代日本的汉语教育，从时间上可划分为两大阶段：从明治前期到甲午中日战争，为第一阶段，从甲午中日战争，经过日俄战争、“九一八”事变、“七·七”事变，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，为第二阶段。

一、明治前期至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汉语学习潮流的兴起。

明治维新以后，新政府废除了幕府时代的“唐通事”制度，同时也结束了将汉语叫做“唐话”的提法，改称为“清语”或“汉语”，后来又统称为“支那语”。

明治时期，日本的汉语教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变：教学内容从古典文言转变到以白话为中心，汉语口语从南京官话转变为北京官话；汉语教育的价值从文化意义转变到主要追求实用；汉语的作用由向中国学习的媒介变成了向中国扩张的工具。另外，明治维新以前，没有专门的汉语学校、专职的汉语教师，明治维新以后，出现了专门的汉语学校、专职的汉语教师，而且陆续编写和出版了新的汉语教材。这些转变，标志着明治时期日本的汉语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。

近代日本汉语教育的第一阶段，是从外务省设置“汉语学所”开始的。1871年4月（明治4年），日本与中国清政府缔结《日清修好条约》，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，迫切需要汉语翻译。为了培养汉语翻译，当年2月，日本政府在外务省下属设立了“汉语学所”，同时也设立了培养俄语和德语翻译的“洋语学所”。汉语学所学生不多，基本都是由各藩通过考试选拔的。当时汉语学所没有教材，沿用了唐通事时期的《二字话、三字话》、《长短话》、《二才子》、《闹里闹》等。1873年，汉语学所、洋语学所移交给文部省管辖，合并为“外国语学所”。不久，又与另外两个学校的英、法、德语学部合并，成立了“东京外国语学校”。1885年（明治18年），东京外国语学校废止，其汉语科转到了东京商业学校，不到半年，由于汉语翻译已满足需要，汉语科被取消。

这一时期的日本，除了官办的汉语学校汉语学所外，民间也出现了汉语学校，主要有三所，一是日清社，二是兴亚会支那语学校，三是日清贸易研究所。

日清社于1876年(明治9年)12月在东京银座开设。创办人广部精,1854年生于上总国君津郡(现千叶县木更津市),父亲属于佐幕派,具有开国主义思想。广部精自幼受父亲影响,强烈意识到,明治维新以后,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侵略面前,日本、中国、印度和整个亚洲面临“衰运”,为了“挽回衰运”必须“日清亲和”,要“亲和”必须“互通语言”。广部精从小就在私塾学习汉学和汉语,1871年到东京求学,1875年2月开始跟中国人教师周幼梅学汉语。1876年12月,广部精创设“日清社”,传授汉语和汉学,教师4人,学生15人,还办了杂志《日清新志》、《寰海新报》。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是学习西方,以讲英语为时髦,学汉语的人很有限,1877年2月日本发生了“西部战争”,日清社学生人数骤减,8月被迫关闭。日清社仅存在了10个月,但它是明治维新以后第一所民办的汉语学校。1880年11月,广部精恢复日清社更名为“日清馆”,1884年10月再次关闭。

广部精的“日清社”关闭之后,1880年,另一所民间汉语学校“兴亚会支那语学校”在东京成立。该学校由“兴亚会”开办,发起人是海军大尉曾根俊虎。他专门到中国作过军事等方面的考察,回日本后以研究亚州问题为中心,集结一些社会上层人士成立了兴亚会,同时开办了这所汉语学校。兴亚会支那语学校设本科和别科,本科是住校生和走读生,白天授课,别科是陆军教导团的下士官,晚上授课。教师除曾根俊虎等两名日本人外,还有一位叫张滋昉的中国人,后来广部精也参加了进来。兴亚会支那语学校存在了两年零三个月,接收过145名学生,其中军人占有相当比重。1882年,由于财政上的原因,兴亚会支那语学校停办。

明治中期,日本急于同欧洲列强争夺中国地盘,扩张欲望日益增长。适应这一需要,1890年9月,一位叫荒尾精的日本人在中国上海办起了一所汉语学校,名称为“日清贸易研究所”。

荒尾精(1856—1896)原是一名军人,学过汉语,曾受陆军参谋部派遣,在武汉等地以经商为名从事谍报活动。他在上海成立日清贸易研究所,名义是培养日中商业人才,实际上是为培养翻译和特务。因而,得到了日本陆军参谋长的支持,建校时,通过陆军参谋本部得到政府内阁机密费四万日元的资助。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生从日本国内募集,体格检查在陆军医

院,学科考试在警察官训练所。学制四年,包括一年商业实习。汉语学习每周12小时以上,还有英语、文学、商业地理、经济、法律等课程。该校先后招收了150名学生,1894年8月第一期学生毕业,恰好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,89名毕业生中的72名,加上7名教职员,全部从军当了陆军翻译和侦探,学校因此而停办。

从汉语学所到日清社、兴亚会支那语学校,又到日清贸易研究所,日本明治初期和中期的汉语学校,不管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,主要目的都是为了适应日本政府的外交、军事、经济的需要,培养向中国大陆发展的汉语人才。

二、甲午战争后到全面侵华时期汉语学习潮流的发展。

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,近代日本的汉语教育进入第二个大的阶段。日本同中国交战的胜利,大大增强了扩张主义野心,为了向中国扩张,需要培养汉语人才,因而重新重视汉语教育。东京帝国大学、早稻田大学和山口、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开始设立汉语课,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也恢复了汉语科。特别是东京外国语学校重新建立,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及汉语教育的动向。

1896年1月,日本第九次帝国议会上,贵族院、众议院同时提出了重建东京外国语学校的建议。该建议很快被政府所采纳,1897年4月,东京外国语学校作为高等商业学校附属外国语学校重新建立,两年后,该校成为独立的外国语学校,即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。

东京外国语学校是官办的外国语学校,无论从所设科目的种类,还是办校的规模,都是日本外语教育前所未有的。首届学生284人,其中清语科(汉语)28人,分正科和别科,正科学制三年,别科三年以下。汉语教师日本人、中国人各一名。教材是改订的《官话指南》和中国人教师金国璞编的《谈论新篇》、伊泽修二编的《日清字音鉴》。东京外国语学校的重新建立,标志着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的汉语教育开始复兴。

甲午中日战争以后,影响较大的民办汉语学校是善邻书院。该校是战争结束、和约签订两个月后在东京建立的,创立者叫宫岛大八,是日本近代有名的汉学者、汉语教育家。

宫岛大八(1867—1943)出生于米泽藩,父亲宫

岛诚一郎是藩士，明治维新后被起用，举家迁到东京。1871年，中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，1877年，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抵东京，喜欢汉诗文的宫岛诚一郎与中国公使馆人员交往密切，宫岛大八深受影响，13岁开始跟中国公使馆参赞黄遵宪之弟黄遵楷学汉语，后转入兴亚会支那语学校学习。1882年，兴亚会支那语学校关闭，他转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学科。1887年，宫岛大八从父亲处接触了清代硕儒张廉卿的书法诗文，对张十分敬仰，经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介绍，去中国拜张为师留学七年，1894年回国。1895年2月，宫岛大八被聘为帝国大学汉文科讲师，教授汉学和汉语，同年5月，自己创立汉语学校“咏归舍”，1898年改称善邻书院。

善邻书院招收的主要学习对象是一般社会人。宫岛大八汉语儒学修养深厚，精通汉字书法，提倡桐城派经世致用的学风，在当时日本汉语学界颇有名气，因而到他那里求学的人很多，后来又开设了一处分校。当时善邻书院之影响，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官办的东京外国语学校。给善邻书院带来声誉的，还因为该校出版了颇有影响的汉语教科书《官话急就篇》。该教科书由宫岛大八编写，吸收了前人经验和本人在中国留学的身体会，比起当时的其它汉语教材，语言标准，内容精炼，现实感强，便于携带，非常适合于初、中级汉语学习程度的人使用，因而倍受欢迎。后来改订再版达170余次，成为日本汉语教育史上再版次数最多的汉语教科书。

善邻书院于1945年日本投降时解散，存在了40年，培养学生上千名，有的学生毕业后成了陆军士官学校、陆军大学校、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等的汉语教师，也有的被征为日本侵华军队的随军翻译等。

与善邻书院同时存在的，还有一所民办的设在中国的日本人汉语学校，即东亚同文书院。该校于1900年由以近卫笃麻吕为会长的东亚同文会创建，起初在南京，叫南京同文书院，因义和团运动爆发，次年迁入上海，改称东亚同文书院。东亚同文会的纲领即东亚同文书院的办学宗旨：“保全支那；帮助支那及朝鲜的改善，研究支那及朝鲜时事，以期实行，唤起国论。”实际上，和以前的上海贸易研究所一脉相承，是为日本向中国扩张培养中国通。

东亚同文书院学制四年，分政治、商务两科，开设课程二十几门，汉语课时最多。系列教材《华语萃

编》，由中国人、日本人老师合编，共四册，四年一贯到底。1933年，东亚同文书院学因办学规模比较大，升格为大学（爱知大学前身）。至1945年日本投降，东亚同文会解体，该校共培养学生4638人。学生毕业后，绝大多数就业于伪满及蒙疆政府及日本在华银行、公司、学校、新闻社等，也有相当一部分当了陆军翻译或特务。

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在最后一学年，有1—3个月到中国内地的调查旅行，调查各地的政治、经济、交通、地理、风俗、文化等情况。然后，写出调查报告作为毕业论文，同时上交日本参谋本部、外务省、农商务省。该校学生的调查旅行遍及中国各个省市，后来整理出版了数十套的《支那经济全书》《支那省别全志》，为日本政府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各个方面的详细情报资料。外务省曾于1907年拨出3万日元，资助东亚同文书院的旅行调查。

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，中国东北为日本所支配，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伪满洲国建立，那里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，大量的日本人蜂拥而入。为了巩固对中国东北的统治，使上百万的日本人适应中国环境，从20年代初开始，以“南满铁道株式会社”为中枢，通过办学校，出版教材，举办广播讲座，搞中国语水平检定测试等，于在华日本人中掀起了普及汉语的热潮。连五六年级的日本人小学生也有汉语课。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汉语普及教材，如“实用汉语”“军用语”“警务用语”“参观旅行用语”等。那场汉语普及运动，动机是侵华治华，但客观上唤起的日本人学习汉语的热情，实属空前。影响到日本国内，陆续有一些大学开设汉语课，各地纷纷举办汉语或中国时事讲座，学习汉语的人数骤增。近代日本的汉语教育，于此似乎形成了高潮，直到战争结束。

总之，近代日本七十多年的汉语教育，主流和动力非常清楚，那就是富国强兵，向中国扩张侵略；教学内容主要是实务用语，军事、贸易方面比重很大；教学方法主要靠简单模仿、练习，缺乏语音语法理论说明；教材出的很多，但质量不高，且大同小异；有一些好的教师，但把汉语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，寥寥无几；汉语教学在大学已有一席之地，但与英、法、德等语种相比，地位低微。尽管如此，若与古代相比，这一阶段汉语在日本传播的广度和深度，尤其是学习者在汉语听说能力的掌握和实际运用方面，均达到了

前所未有的水平。

(三) 战后日本汉语学习运动的开展与高涨

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,结束了向中国扩张侵略的历史,也根本改变了汉语教育的方向。战后六十年来,日本的汉语教育分为两个发展阶段:从1945战争结束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为第一阶段,从中日恢复邦交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为第二阶段。

一、战后至中日恢复邦交前汉语学习运动的逐步开展。

1、日中友好运动与中国语讲习会。

日本战败后的头几年,汉语讲坛曾出现过短暂的沉寂。一是由于侵华战争破坏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,二是由于日本人的注意力已转向国内,关心中国、学习汉语的人数急剧减少。一些高校虽保留或设立了汉语课,但学生人数很少。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当时的日本政府追随美国,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政策,对国民封锁新中国的消息,但民间的日中友好运动很快兴起。1950年4月,日中友好协会在东京成立,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创办中国语讲习会,讲习会请著名汉学者东京大学教授仓石武四郎主持。

仓石武四郎接受了日中友好协会的委托后,一边在东京大学执教,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,一边开展中国语讲习会的工作。讲习会一是传播汉语,主要是现代实用汉语,二是宣传新中国和日中友好。仓石武四郎说:“我们的讲习会决不是出于个的兴趣和爱好,而是为了在日本传播中国语,哪怕是一点,通过中国语增加对中国的了解。”1953年,第一批大量日本残留者从中国回到日本,带回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信息,而后,关心中国、学习汉语的人渐渐增多。在日中友好协会的推动和仓石武四郎的主持下,中国语讲习会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,彻底改变了战前那种为扩张侵略服务的错误方向,走上了为促进日中友好服务的正确轨道,标志着日本的汉语教育与学习运动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。

1958年,仓石武四郎从东京大学退休,全力以赴投入中国语讲习会的工作。1964年,中国语讲习会更名为“日中学院”,成为正式的语言专门学校。首任院长仓石武四郎为该校的办学宗旨亲笔提词:“学好中国

语,为日中友好起桥梁作用”。在日中友好的旗帜下,日中学院的教学特色更加鲜明:以教授现代汉语为中心,强调汉语听说能力的训练,促进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。为了适应新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特点,仓石武四郎亲自编写了《中国语初级教本》(1—4分册)《中国语中级教》(上中下)等教科书,对学生进行汉语语音语法、日常会话以及中国文化知识的系统训练。同时,经常选一些新中国的报刊文章作为教学资料,并组织师生用汉语表演文艺节目。每当有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时,还组织报告会和座谈会等活动。截止到1975年,在仓石中国语讲习会和日中学院学习过的人,已达五万人次之多。

1952年4月、1964年4月,仓石武四郎还分别在NHK电台和电视台开办了“中国语讲座”,利用现代技术将汉语传播到了日本全国。

2、中国语学研究会成立与汉语教育改革。

1946年10月,由仓石武四郎发起,在京都成立了日本中国语学研究会(1978年改称为中国语学会),它是日本战后汉语学界第一个全国性学术组织。通过成立中国语学研究会,一是把全国从事汉语教育的教师、学者聚合起来,使分散薄弱的力量变成了团结有力的队伍,为战后日本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组织基础;二是为了开展全国性的学术交流,明确汉语教育思想与教学方针,把日本的汉语教育事业导入健康发展的轨道。中国语学研究会成立以后,每年定期召开学会,研讨汉语教育中的一些共同性问题,交流教学经验与学术成果。作为重要的汉语学术阵地,学会还出版了会刊《中国语学》,刊载会员的研究成果。

战后日本的汉语教育还发生了另一重大转变,这就是,脱离了只把汉语教育作为实用工具,不承认其也是一门学问的阶段,开始把中国语学作为一门学科,不仅重视其实用性,而且也重视其学问性。战前日本的汉语教育界,虽有人就汉语和汉语教育的某些问题作过一些理论性探讨,并有少量著作出版。比如伊泽修二的《日清字音鉴》、何省三的《支那语正音发微》等。但是,汉语和汉语教育的文化性、理论性、学问性,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,统治日本汉语教育讲坛的,基本是“唐通事”以来无语法、无理论指导的家学主义、实用主义传统。1941年,仓石武四郎发表《支那语教育的理论与实际》,吉川幸次郎发表《支那语的不幸》,曾尖锐地指出日本汉文和汉语教育的弊病,企

图唤起人们对汉语和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重视，然而并未引起强烈反响。1946年10月中国语学研究会成立后，动员和组织全国的汉语研究和教学工作者，联系汉语教学实际，加强了汉语和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，使汉语教育的学术地位逐渐提高。1954年10月，在金泽大学召开的中国语学研究会第五次全国大会，曾以“中国语教育方法论”为题进行专门研讨，针对汉语教学中忽视语法、忽视教学法等倾向，加强了对“中国语也是外国语”，必须遵循外语教学规律的认识，大大提高了对汉语和汉语教学规律研究的自觉性。1958年为纪念中国语学研究会成立十周年时，出版了《中国语学事典》一书，是50年代日本汉语界十年成就之总结，它反映了日本的汉语教育已摆脱家学主义、实用主义的旧传统，与英语、德语、法语等其他外语教育一样，成了一门独立的语言教学与研究学科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力推进文字改革，日本汉语教育界积极跟进。日本中国语学研究会会长仓石武四郎，1954年、1960年曾两次访华，重点考察中国的文字改革情况。1952年、1958年，仓石武四郎的两本专著《汉字的命运》、《从汉语到罗马字的文字与日本》，分别由岩波书店和弘文堂出版，代表了日本对中国文字改革的深入研究。1953年6月以后，仓石武四郎陆续出版的《拉丁化新文字中国语初级教本》、《罗马字中国语初级》、《罗马字中国语语法》、《中国语入门》、《中国语发音教室》、《NHK中国语入门讲座》等许多课本以及工具书《岩波中国语辞典》，就是在吸收新中国文字改革以及中国“五四”以来新文化运动成果的基础上，利用新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编写的，并贯穿了作者历来的重视听说，重视语法，重视现代内容的汉语教学思想，深受广大汉语教师和学习者欢迎，对五、六十年代日本汉语教学面貌的更新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在以仓石武四郎为代表、以中国语学研究会为主体的日本全国汉语教师、学者的努力下，除了社会上朝气蓬勃的汉语学习运动外，新型汉语教学在大学教育领域也影响在扩大，地位在提高，以阅读古典汉文为中心的传统的汉语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被破除，开展汉语教学的大学虽然数量还不多，但在逐渐增加，重视口语、重视语法、重视现代内容的新的汉语教学风气开始树立起来。

总之，战后五、六十年代日本的汉语教育，与战

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，端正了方向，走上了正确轨道。不过，由于当时的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，日中友好运动只能在曲折中前进，两国人民的交往受到限制，传播和学习汉语运动受到右翼势力的阻挠、破坏，汉语教育的地位、发展规模、取得的实绩，远不如七十年代以后。

二、日中恢复邦交和中国改革开放后“汉语热”的迅速升温。

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，197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，标志着日中两国完全结束了敌对的历史，进入到了崭新的历史阶段。两国之间的政治、经济、贸易、教育、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，象开了闸的河水一样奔腾起来。新的日中关系，前所未有的友好交流形势，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，使日本国民关心中国、学习汉语的热情空前高涨，学习、推广汉语形成了洪流，汉语教育地位之高，发展规模之大，汉语传播范围之广，超过了日本历史上任何时期。

1、学习汉语人数急剧增加。

五、六十年代参加汉语学习的人，都是日中友好运动的积极分子，中老年人居多，人数及人员构成范围有限。自七十年代以后，一是学习汉语的人数急剧增加，仅“NHK”广播电视讲座教材每年就销售上百万册。二是学习者的社会分布范围迅速扩大，各行各业的人都有。学习汉语的途径、形式灵活多样，或在大学、专门学校、汉语教室，或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讲座，或请个人面授，或到中国留学。学习者的学习动机，八十年代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：友好型、旅游型、实用型。九十年代以来，学习动机、目的越来越多样化，想用汉语从事实际工作的日益增多。为了持久不断地推动汉语学习运动的普及与提高，各种汉语水平鉴定考试应运而生，于1981年最早成立的“日本中国语检定考试协会”，九十年代以来每年应试者达3万人。中国在全球推广的“汉语水平考试”（HSK），日本也是应试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。

2、大学普遍开设了汉语课程。

七十年代以前，日本虽然有些大学设有汉学课程，但主要是讲授中国文学、哲学，教学内容基本都是中国古典诗文，专门开设汉语课程的，只有外国语大学和少数综合性大学，汉语课在大学教育中地位很

低。七十年代以后，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日本社会上的“汉语热”不断升温，汉语教学在大学里越来越受到重视，开设汉语课的大学迅速增加。进入九十年代以来，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了汉语课程，无论是作为第一外语，还是作为第二外语，选择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德语、法语、俄语、西班牙语等其他外语，汉语成了仅次于英语的“热门外语”。

3、汉语专门学校蓬勃发展。

战前，日本汉语专门学校的数量屈指可数，而且多数没有存续下来。战后五、六十年代，包括新成立的日中学院，汉语学校寥寥无几。可是，自1972年后，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，汉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一般的专门学校开设汉语课姑且不算，仅专门的“中国语学院”就有三、四十所，学生少则几十人，多则数百人。比起大学的汉语教学来，汉语专门学校更重视培养学生实际运用汉语的能力，对于不是只为学历而是为了真正掌握汉语的人们来说，颇具吸引力，吸纳了大量社会上的汉语学习者。除了汉语专门学校外，日本全国各地还有星罗棋布的“中国语教室”等业余汉语教学组织。另外，开设汉语课程的高中乃至初中也越来越多起来了。

4、赴华留学形成潮流。

要想真正掌握汉语，最好的途径是去中国留学。日本自奈良、平安朝时期始就有派遣使臣、学问僧、留学生到中国求学的传统。明治维新以后，日本成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，吸引了大批中国人到日本留学，同时，也有不少日本人到中国学习汉学和汉语。不过，在日本历史上，从来还没有像最近二、三十年这样，到中国留学的潮流来得异常迅猛，人数庞大。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，敞开了接收外国人到中国留学的大门，一些日中友好团体和留学中介机构，每年都组织众多的日本人到中国留学。进入九十年代以后，随着汉语教学在大学越来越受到重视，通过校际交流与合作关系，由大学直接向中国的大学派遣学生的情况日益增多，不少大学都将派学生到中国进行短期语言研修或长期留学，纳入了教育计划。据统计，每年到中国留学的日本人达15000名左右。

5、师资队伍迅速壮大。

日本近代史上曾出现过数次“汉语热”，但职业汉语教师并不多，而且没有形成稳定的队伍。战后五十年代，全国专任汉语教师才数十人，七十年代增加

到二、三百人。到了八十年代，学习汉语的人数急剧增长，汉语教师的数量也迅速膨胀，达到五、六百，到了本世纪初，已形成两千人以上的大军。日本的汉语教师队伍主要有以下四部分人组成：从战前就已开始从事汉语工作的老一辈学者、教师；战后五、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汉语学者、教师；近二、三十年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汉语学者、教师；在日本就业或由中方派遣赴日任教的中国人汉语教师；从事中国文学、哲学、历史等方面的教学、研究，同时也担任一定汉语教学任务的教师；除了专任教师之外，还有许多非常勤汉语教师。如今，日本汉语师资队伍数量之庞大，不仅是日本汉语教育史上之“最”，在国际上也乃首屈一指。

6、学术研究十分繁荣。

过去在很长时间内，日本的汉语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，学术研究开展的即不广泛也不够深入。战后以来，特别是近二、三十年来，日本汉语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。教师们积极开展汉语和汉语教学研究，在汉语的文字、语音、词汇、语法、日汉比较、教学法等各个方面都有人在深入研究。汉语不仅充分地实现了实用价值，而且其研究价值、文化价值也得到了充分体现，“中国语学”已成为日本学术界的一个热门学问。以一年一度的日本中国语学会年会为代表，汉语学界的各种学术讨论会不断举行，学术活动十分活跃。汉语学界的专门刊物《中国语学》、《中国语研究》、《中国语》等定期出版，各个大学、研究机构的纪要、学报等，发表了不计其数的汉语方面的学术论文，许多学者出版了专著，汉语和汉语教育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从未如今天之多。

7、新编教材层出不穷。

应该说，战前七十年多年间，在一轮又一轮的“汉语热”时期，汉语教材的出版还是满热闹的，多的时候一年达二、三百种。但是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汉语教材很少，战后几乎统统被淘汰了。五、六十年代新编写出版了一些内容和形式比较好的汉语教科书，但数量、品种比较少。而近二、三十年来，日本汉语教材的编写和出版，无论数量、品种还是内容、质量，都远远超过了过去的任何时期。八十年代就已形成了以白帝社、白水社、骏河台出版社、金星社为支柱，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汉语教材的局面。到了九十年代，各家出版社每年出版的汉语教材，少则几十种，多则

上百种,初级的、中级的、综合的、会话的、听力的、阅读的、电子版的……源源不断,百花齐放,色彩纷呈,简直令人眼花缭乱,可以满足各种汉语学习者的需要。

8、国际交流空前活跃。

首先,日本汉语学者与中国汉语学者的交流机会空前增加了。在新的条件下,日本的汉语学者、教师到中国访问、考察、进修、出席学术会议,十分方便、频繁,已习以为常。中国的汉语学者、教师到日本访问、考察、任教、出席学术会议,也已司空见惯。日本的很多大学与中国的大学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。其次,日本学者、教师积极地与中国学者、教师合作编写教材、字典,或合作研究,双方优势互补、各尽所长,出了不少有特色、质量高的成果。另外,日本汉语学界还加强了与世界其他国家汉语教育界的交流。在各种国际性的汉语或汉学研讨会上,尤其是每三年一次的“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”,除了中国以外,日本经常是与会人数最多的国家。

总之,近二、三十年来,日本的汉语教育实现了真正的繁荣,持续的时间也最长。出现这次“汉语热”的根本原因,是中日两国“大气候”的影响,倘没有七十年代日中邦交的正常化,没有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,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。日本这次“汉语热”的兴起和发展,经过了三个时期:从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到197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定,日本人重新焕发起对中国、对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热情,是预热期;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,中国的改革开

放形势不断发展,日中两国的交流迅速扩大,日本学习汉语的人数逐年递增,是升温期;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,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,日本人学习汉语的人数有所减少,“汉语热”出现了短暂的降温;九十年代中期,日本学习汉语的人数回升,而后一直保持着正常、平稳发展的态势。

那么,今后日本的汉语教育形势会怎样呢?我们认为,由于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,文化关系密切而源远流长,由于中国越来越开放,越来越强盛,由于日中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紧密,不可分割,因此,学习汉语越来越成为日本人的希望和需要。因历史、领土等问题,日中关系虽有时会出现波折,但从长远看,睦邻友好、和平共处、人员频繁往来的大势不会改变,日本人学习汉语的潮流必然奔流不息,日中之间的“汉语桥”将越来越宽广。

参考文献:

- 《漢字・漢語概論》,中沢希男,教育出版,1978年初版。
- 《日本漢字音の歴史》,沼本克明,東京堂,1986年初版。
- 《日本漢字音史論考》,湯沢賢幸,勉誠社,1996年初版。
- 《漢字と日本語》,前田福祺、野村雅昭(編集),朝倉書店,2005年初版。
- 《中国語教育史の研究》,六角恒广,東方書店,1988年初版。
- 《中国語教育史論考》,六角恒广,不二出版,1989年初版。
- 《中国語五十年》,倉石武四郎,岩波書店,1973年初版。
- 《中国へかける橋》,日中学院,並紀書房,1977年初版。